準確理解中央對特區管治團隊的監督責任

焦點熱議

張　璇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日前發表重要講話，對「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準確貫徹落實，作了深刻的闡述與精闢的分析，發人深省。但香港一些反對派媒體卻刻意歪曲誤導市民，尤其是涉及「行政主導」以及中央對特區管治團隊負有監督責任的核心概念。事實上，這些絕非新的權力或是所謂的權力擴張，而是一直以來由基本法所規定或賦予的制度安排。中央的「監督責任」並非什麼都管，更不是反對派所故意抹黑的「什麼都要聽話」，而是指在一些重大原則問題上，作爲一國之下的中央政府，必須肩負基本法所要求的應盡責任。這是中央「全面管治權」的一個重要體現，回歸二十年來一直皆是如此。

委員長的講話要全面去理解。他在總結基本法實踐經驗時提出了四點：一、要牢牢把握「一國兩制」的根本宗旨；二、要堅定維護以憲法和基本法爲基礎的特區憲制制度；三、要始終堅持以行政長官爲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四、要充分發揮香港特區基本法賦予特區的高度自治制度優勢。而涉及「監督責任」的是在其中的第三點提及。也就是說，監督責任是建基於準確對特區「以行政長官爲核心的行政主導」制度之上。這需要從特區憲制制度去全面理解，而不是簡單地去看中央的監督。

長期以來，香港一直有種聲音認爲，香港是沿襲英國統治時期的「三權分立」，因此基本法規定下的也就是「三權分立」。這顯然是對歷史的嚴重誤讀。首先，香港從未實行「三權分立」，甚至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港督身兼行政、立法兩權的「首長」，司法雖然相對獨立，但同樣嚴重受制於行政機關。而雖然基本法並沒有明確寫明「行政主導」，但在多條法律當中已作出了「事實上的規定」。

正因如此，張德江委員長便指出，香港特區基本法所規定的特區政治體制，不是「三權分立」，也不是「立法主導」或「司法主導」，而是以行政長官爲核心的行政主導。這一特殊的設計，符合香港作爲一個地方行政區域的法律地位，是最有利於香港發展的制度安排。

而基於特首「雙首長」、「雙負責」的身份，這就意味着行政長官是連接中央與特區、「一國」和「兩制」的重要「樞紐」，必然要在特區政府權力機構的運作中處於主導地位。在這種行政主導制度之下，特區的行政、立法是一個「既相互制衡又相互配合」的關係，司法機構獨立行使審判權，各個機關依照基本法規定的許可權共同維護行政主導體制的正常運作。

委員長的講話中還有一句值得注意的內容，他指出：「將來特區政治體制的發展和完善，也必須符合行政主導的基本原則。」這就是說，未來不論政改如何推進，特區的「以特首爲核心的行政主導」制度是不可能發生動搖。

好了，既然特首地位如此重要，在「一國」之下，作爲中央政府也就完全有必要確保這一位置的人選不會違背基本的原則，而特區主要的管治團隊，也必須遵從這一基本原則。所以委員長指出，特區管治團隊，必須由尊重中華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不損害香港繁榮穩定的愛國者組成。尤其是處於政治體制核心位置的行政長官，要符合愛國愛港、中央信任、有管治能力、港人擁護的標準。中央對特別行政區法定公職人員是否擁護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是否效忠國家和特別行政區，負有監督責任。

這種監督責任，是基本法所賦予的權力，絕非反對派所謂的「新加權力」，更不是一些反對派寫手所抹黑的「要求所有人聽話」。至於監督責任的具體內涵，事實上同樣在基本法內有了明確的規定，尤其在「是否效忠基本法」、「是否效忠國家」、「是否效忠香港特區」三點，中央有強大的監督責任。相信這些原則性問題並不難分辯，試問管治團隊中出現「港獨」，中央是否應當採取法律所賦予的權力？

認眞體會委員長講話中的政治意涵，對香港日後全面準確落實基本法，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

正確理解「授權」與「被授權」關係

王偉傑

張德江委員長出席基本法實施20周年座談會，發表了一篇語重心長的講話，讓特區政府及其管治團隊有清晰的施政綱領，委實是用心良苦。適逢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身爲中國的香港人，應該好好細味咀嚼「一國兩制」的涵義，社會上便可少些無謂的政治爭拗。

「一國兩制」的構思源遠流長，其精髓之處在於以和平方式完成祖國的統一大業，故此任何跟這個大前提有所抵觸的，都必須予以遏制。1984年簽訂的《中英聯合聲明》明確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並承諾香港特別行政區可以保留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

「一國兩制」，顧名思義是在一個中國下，內地和香港分別實施有特色的社會主義及資本主義兩種制度。在「一國兩制」的基礎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基本法》的規定實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無論在次序及措辭上，都相當精確，沒半點含糊。「兩制」是建基於「一國」的基礎上，沒有「一國」，焉有「兩制」？「一國」與「兩制」孰輕孰重，根本沒有討論的空間。

「港人治港」的理念與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有緊密聯繫，按《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規定，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這項安排反映出中央政府對香港人的信任，不委派行政長官這個舉足輕重的職位。高度自治則說明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突顯出香港特別行政區與內地其他省市自治區存在獨特的差異。

20年來，中央政府恪守港人以資本主義形式生活的承諾，但反對派在回歸後，爲「一國兩制」又作出了什麼貢獻？

香港未能爲捍衛國家主權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使得危害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港獨」勢力於近年肆虐，最終只得由人大釋法平息風波。有「小憲法」之稱的《基本法》未有全力推廣和普及，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及其他目無法紀的人在公衆場合焚燒及撕毀《基本法》。一些人對港人在世界各地享有中國大使館保護人身安全的權利隻字不提，矢口否認自己是中國人。

試問上述少數港人的行爲又怎能算作履行約定？誠然，不尊重「一國兩制」的香港人截至目前爲止仍居少數，愛國愛港的香港人是絕大多數，但我們絕不能有半點懈怠。張德江委員長對特區政府如何知人善任給予善意提醒，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如何不變形、不走樣。反對派議員應審時度勢，落實有益於港人整體福祉的方案，絕不應借用個別傳媒胡亂炒作。讓香港在「一國兩制」這個舉世無雙的平台上，於國際社會大放異彩。

政賢力量評論員

促進兩地融合的必要舉措

學者論衡

陳文鴻

香港與珠江三角洲的融合本是必然之事。兩地地域相連，再加上「九七」回歸，原來政治隔阻的因素都消除。重回一國之內，應回復到1950年美國制裁中國之前，中國人在香港自由出入、不用登記檢查的情況。很可惜，由於政治上的妥協和失誤，香港的自治竟變成對融合的實際排斥。過境比以前略爲方便，但依然還有衆多的煩瑣手續，還是「兩地兩檢」，出入登記檢查，還是費時失事，比不上人家兩國之間的出入通暢。「一國兩制」變成「兩制」對抗的藉口，政治上人爲地延續了殖民地時代香港與內地的隔阻。

落實協商機制成果

事實上，在當今技術發展迅速底下，即使要登記檢查，還有許多技術手段可用來減少手續的時間，如臉孔檢查，如身份證作「一地兩檢」，完全可在電腦上操作。香港與內地往返便可由公交與軌道交通直駁，不需下車上車在口岸排隊通過。回歸後香港的科技應用並不長進，或許以落後的技術操作，增添過境的成本與麻煩，才滿足特區內一些人反對與內地連接的心態。

回歸二十年，香港與內地融合緩慢，一是特區內一些人的消極與抗拒，另一是內地有關部門的因循，缺乏積極性。廣東與廣州、深圳等都與香港政府建立了協商合作的機制，會開了不少，政策措施也定了不少，實際落實執行的有多少呢？遠遠不符理想！

或許中央與內地政府要明白特區內一些人的消極抗拒，與其被他們拖着後腿，延誤時機，倒不如撇開他們，由內地主動積極推行融合措施，改變現狀。中央提粵港澳大灣區，以粵爲首。廣東省自應在中央支持下率先推動大灣區的融合發展。方法未必需要政治上的石破天驚，而應集中容易推動卻影響深遠的措施，不像以往的合作只集中於企業和投資者，忽視普羅大衆。

一是把香港與珠江三角洲九市，乃至內地所有地方，按中央取消電信漫遊與國內長途的做法，同步取消漫遊與國內長途的收費。假若香港本地的電信公司抗拒，便由內地在港的電信公司(如中移動等)執行，用市場競爭壓力迫使其依從。這既是一國化，也是全球化。重點不是語音通信而是數據傳遞。或許要配合內地的網絡安全，可加上實名登記。

二是把香港網絡支付系統與內地連接。內地的公交、鐵路系統應可調整以與香港的八達通相容並用。但最好的方法是把內地的網絡支付系統在香港落地，與香港的監管系統與技術標準連接。實際上不僅打通香港與內地，特別是珠江三角洲的公交鐵路的支付相通，方便民衆。同樣地迫使香港八達通系統與內地支付系統相容連接，並推動香港網絡支付及相關服務的發展，改變香港現時的落後境況。作用便是連接加上發展。

三是珠江三角洲的電視台節目在港落地，包括中央台、珠江台和深圳衛視等。方法可以是與香港電台電視等合作，目的是讓香港居民可以有自由的選擇，方便收看內地及珠江三角洲的節目。達到互相了解、民心相通的效果。

鼓勵民間跨境交流

四是民間多辦跨境交流活動。例如香港與深圳或其他珠江三角洲城市的藝術節、音樂節、電視競賽、跨境的科學交流、創新創業合作，中學校際的雙邊多邊活動，如與電視台合辦校際比賽——成語、詩詞、英文串字、科普常識、文化知識，或「一帶一路」認識等。深圳、廣州等地的大學也可與香港的大學、中學、社團合作研究各地相連相通的歷史、進行文化考察、社會體驗等等。在文化的層面上，有着衆多的範疇可發展兩地的交流。香港與珠江三角洲的融合，正因爲有歷史、文化、血緣和經濟的緊密關係、容易順水推舟，關鍵只是要打破僵化的體制與心態。這只能靠中央與廣東省政府，而不是還沒有去殖民化的香港特區。

香港珠海學院「一帶一路」研究中心主任

警惕金融風暴再現

名人堂

方潤華

近日，香港金融管理局前總裁任志剛先生就香港回歸二十周年發表之感想，其有關預警金融風暴或至的評語，令人警醒。

他表示，二十年來本港在貨幣穩定及金融安全方面取得不俗成績，但需要居安思危，因引起上兩次金融危機之華爾街博弈模式、投資炒作文化仍未得到解決，加上全球推行貨幣寬鬆政策下資金氾濫，外資透過投機炒賣行爲獲利。回顧過去數十年，每逢「七」或「八」字尾年份金融風暴就出一次，故擔心金融危機有可能再次來襲，並預警「如果出現下一個金融風暴，會比之前更厲害」。要提防大鱷興風作浪。

任先生於金管局任職多年，曾有帶領港人應付多次金融、證券危機的經驗，講話並非危言聳聽。他表示並非迷信經濟衰退循環（Cycle），而是從數據、邏輯、世界經濟走勢及美國金融文化等方面分析，作爲論據得出這個訊號，出發點是爲提醒普通市民在買樓、投資證券時心理上早作準備，將來面對加息周期來臨或世界經濟出現波動時，供樓及投資要負擔較高利息，這樣才較爲安全。

借用《同舟共濟》中歌詞提醒大家：「我同你同坐這條船，無情浪把它猛捲，滿天風雨，視野未能見，亂作一團，不知怎算。既決意留在這條船，齊齊令不遭受破損，困境挑戰，奮勇面對，令這條船，永不翻轉。」發揮愛港精神，風雨同舟、和諧共濟。

筆者預測今年或許還不致出現危機，但二〇一八年又如何？那就要看今明兩年的投機熱炒程度，世界加息潮的快慢或高低而定。事實上，各國政府亦已開始部署退市及「縮表」，美國兩年來已加息多次，啓動了加息周期。香港實施聯繫匯率利息跟美國掛鈎，不得不跟隨，加息只是時間問題。由此可見，「息魔」已悄然埋身，低息環境還可以持續多久？若過度借貸，到時息口上升，無疑增加資金成本，對大家來說都不是好事。

香港政府亦多次推出「辣招」爲熾熱樓市降溫。假定股市、樓價再急升百分之十至十五，或成爲金融危機的導火線，可能啓示此乃風暴的前夕？另閱中華書局出版之《海航的神秘密碼》，書中提及二〇〇八年前夕，某公司以「扁鵲見蔡桓公」看病故事的寓意，未雨綢繆、洞察危機，早做預防風暴的緊急措施，得以閃避風險，安全渡過危機，從而乘勢於危機發生後抓住良機，得以加快發展。以史爲鑒，不單化險爲夷還得以穩固、壯大。

對於金融風暴、證券、樓市很難作出準確預測，個別投資者的觀點見仁見智，可因各人的經驗、判斷和分析作出決策，較爲實際和正確。王琳所著《淡定力》其中一段曰：「不貪心是戳穿一切圈套的秘密武器。」是否可以借用作爲參考？蘇軾《晁錯論》中也有「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告誡世人要有憂患意識，及早作出適當安排。也可試從《孫子兵法》中借鑒應變策略或手段，力求保本求穩，安度平安之岸，有驚無險可視人生一樂。高齡的投資者更要步步爲營，健康平安是福！

G7峰會遇新面孔新問題

張敬偉

近日在意大利西西里島召開的七國集團（G7）峰會很有意思。七國領導人中有四人是新面孔：美國總統特朗普、法國總統馬克龍、英國首相文翠珊與意大利總理眞蒂洛尼。新面孔不怕，都是政壇老江湖，但新問題倒是不少。美國總統特朗普在貿易問題和《巴黎協議》上直言不諱，這讓G7彌合分歧解決問題的能力大幅降低。

就是這樣的尷尬峰會，G7會後公報還是提了東海和南海問題。對此，中國外交部表示了強烈不滿。28日，外交部發言人陸慷表示，對七國集團假借國際法名義對東海南海問題指手畫腳表示強烈不滿，希望七國集團和域外國家認清形勢，停止發表不負責任的言論。

G7對西太平洋的關切，始於日本。奧巴馬時代的亞太再平衡戰略，鼓勵日本充當制衡中國的馬前卒。於是安倍首相在過去兩年的G7峰會期間，將南海和東海問題作爲私貨硬塞進G7峰會中。由於奧巴馬的支持，其他西方國家也不得不照顧日本的情面。

本次峰會，美國和與會各國的矛盾凸顯，尤其是特朗普對德國很不感冒。文翠珊不僅有脫歐難題，剛剛遭遇了曼徹斯特恐襲，而且還要警告特朗普要好好重視美英之間的情報交換保密協議。馬克龍是新手，眞蒂洛尼是東道主，特朗普是霸氣襲人。G7自己的事都難以達成共識，還關切遙遠的西太平洋，眞的是偏離主題了。

只能說，G7作爲世界上最強大的大國集團，已經名不副實了。不管如何，都要沾上和中國相關的議題來彰顯自己的存在。

平實而論，本次G7峰會，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對南海和東海的關切也不如以往，他關注的議題有三：一是全球化下的自由貿易；二是朝鮮核導問題；三是所謂的TPP。除了第一個命題，後兩個問題都和峰會沒有多少關係。但是安倍此舉頗有自己的深意。

一方面，他是利用和特朗普建立的良好關係，來確保G7峰會的團結。也就是說，

路透社

他要利用自己是峰會資深人士的身份（加上本次，安倍已經參加過6次G7峰會，德國總理默克爾是12次），希望在美歐之間充當和事老。這即可體現日本的價值，亦可促成G7的團結，以便穩固G7峰會的全球領導力。

另一方面，朝鮮核導和TPP攸關日本核心利益，他希望借助G7峰會，實現日本的現實利益。更要者，這兩個議題也都攸關美國，在特朗普將安倍視爲老朋友的現實下，安倍除了要藉力美國來解決朝鮮核導問題，當然也要強化和特朗普的共識，促使中國在朝鮮核導上發揮更大作用。事實上，安倍的目的達到了。在美日首腦會談中，安倍放低了南海的調子，沒有強力要求將此寫入會議公報，但在朝鮮核導問題上「希望加強和中國的溝通」，特朗普認可了他的觀點。至於TPP，安倍希望特朗普回心轉意，但他知道這沒有希望。安倍已經明確表示和澳紐等11國繼續推進TPP，以便主導區域貿易規則。

安倍在東海南海問題上沒有像以往堅持寫入會議公報，但是G7還是提到了東海和南海問題。內中釋放的意味是很明確的：一是作爲西方世界的大國集團，G7希望主導全球局勢，尤其是以此向中國傳遞信息，G7依然是全球秩序的主導者。二是確實是爲日本政府面子，不管安倍是否領情。畢竟，在G7內部矛盾不斷、特朗普故意攪局的情勢下，安倍首相在其中發揮了和事老的作用，給日本一點說法也符合邏輯。三是從美國到歐洲國家，他們對中國有根深蒂固的偏見，即認爲中國崛起會破壞其在東海和南海的航海自由。因而，關注西太局勢，也是G7條件反射式的行爲。

值得關注的是，中菲關係改善後，中美艦船和飛機在南海區域的對峙也少了。但少並不意味着沒有，近期中美兩國又發生了戰機巡航中的「親密接觸」。這也凸顯，雖然特朗普的戰略重點未必是西太平洋，但是美國軍方會不時製造事端。基於國內外形勢的變化，特朗普也會藉用東海和南海問題來和中國博弈。

因而，中國要高度關注G7對東海和南海的指手畫腳。否則，這個西方國家集團就會以各種形式染指中國的核心利益區域。這是中國絕不能允許的。對於G7的越界，中方要察其言觀其行。

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